

北平「邊界談判」現狀及中蘇共關係之展望

——從「邊界談判」看中蘇共關係之三

尹慶耀

一 邊界談判與對峙現狀

中共與蘇聯的鬥爭，是多面性的，因此，北平的邊界談判，並不單純限於劃界問題。

北平舉行的是副部長級談判，蘇聯的代表團長原為其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庫茨涅佐夫（V. V. Kuznetsov），他是折衝樽俎的談判能手，一九六八年八月捷克事件時就出過風頭。然而中共把「談判」看作「針鋒相對」的鬥爭策略之一，它並不急於解決邊界問題，談判自然會曠日持久而無結果，於是庫茨涅佐夫乃於一九七〇年六月三十日稱病離平，改由蘇聯外交部副部長伊里切夫（I. F. Ilichev）接任團長職務。事實上，庫茨涅佐夫并無病痛，不久他就又在外交方面展開活動了。

繼任團長的伊里切夫其人，原本是黑魯曉夫時期蘇共中央的思想理論委員會主席，黑魯曉夫失勢後，他也改任外交部若干副部長之一，是相當投閒置散的。北平談判既已馬拉松化，那麼由坐冷板凳的伊里切夫接替忙碌的庫茨涅佐夫，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但是，我們注意到中蘇兩個共產政權的分裂，原是由意識形態亦即理論策略之爭所引起，在雙方談判中，當然會涉及這些問題，那麼蘇聯以伊里切夫為代表團長，就堪稱適當人選。

其次，我們注意到，一九六四年中共和蘇聯的邊界談判中，蘇聯的首席代表是日里亞諾夫（P. I. Zirianov）上將，他曾是蘇聯邊防軍總部的司令官。一九六九年以後的談判中，由邊防軍副司令甘科夫斯基（Gankovskiy）將軍任副團長，不久前，他的職務又由邊防軍參謀長羅班諾夫（Vasily F. Lobanov）將軍取代。邊防軍並非國防軍，不隸屬國防部而隸屬國家安全委員會，是特務系統，其主要任務為防止人民逃亡和外來的滲透，當然也會在鄰國邊界搞間諜活動。在邊界談判中，蘇聯始終有個邊防軍的將軍參加，是值得注意的。那暗示蘇聯的威脅不限於軍事，而中共所稱蘇聯在中國邊境地區派遣間諜、搞顛覆活動，并非全無根據。蘇聯不肯輕易放棄它對中共的政治、經濟、軍事以及顛覆威脅，中共則盡量揭露蘇聯的「新沙皇」面目，那麼雙方的邊界談判，也就難有進展了。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伊里切夫重回北平恢復談判，十二月十五日北平就傳出消息說，中共認為，伊里切夫返平，只是爲了牽制美國，對於談判則毫無誠意。中共方面透露，這一次的邊界談判，是以與一八六〇年北京條約有關的爭議地區，在條約上如何解釋、處理，以及河川航行、邊界標識等爲主要議題。其他如一九六九年三月發生衝突的烏蘇里江的珍寶島、七月間發生衝突的黑龍江的八岔島，沿黑龍江省長達四、〇五〇公里的中蘇邊界，還有烏蘇里江上的九十三個小島、沙洲當中面積三〇〇平方公里最大的黑瞎子島週圍的航行問題等，也都在談判之列。但是，蘇聯堅持它過去的立場，不承認北京條約是不平等條約，認爲爭議地區（認係蘇聯領土）并不存在，不肯作絲毫讓步。因此中共指蘇聯在利用邊界談判爲工具，製造「中」蘇和解假象，以便將來能站在有利的立場與美國的卡特政權週旋。①如此說來，蘇聯同樣是以談判爲鬥爭工具了。

與此同時，日本北海道文化代表團（團長爲北海學園大學校長高倉新一郎）在中國大陸訪問期間，曾經聽取了中共黑龍江省負責幹部的簡報，其要點如左：

甲、現狀

(1) 中共方面主張根據國際法，以河川的主流航道中心線爲兩國邊界，蘇聯則主張以靠近中國方面的河岸爲界。在七百多個島嶼中，有總面積一、〇〇〇平方公里的六百多個島嶼，依中心線劃分應屬中國，但被蘇聯并入自己領土。其中最大的是烏蘇里江與黑龍江合流處的黑瞎子島等，總面積三〇〇平方公里，該島於一九〇一年尚在清廷支配下，當時在該地居住的中國地主，迄今已達十五代，現在則成爲蘇聯反中共宣傳廣播的基地。

(2) 蘇聯沿國界線配置包括地對空飛彈、裝甲車隊等的四十個師，連續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一九七六年七月的一次演習，乃陸海空聯合作戰，并有間諜訓練。

乙、蘇聯的侵略與干涉事件

(1) 從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五年，蘇聯侵犯邊界及對中國居民實施暴行、開鎗、妨害生產等事件，已約達九千件之多。僅一九七六年一至八月，即有一五〇次。

(2) 從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九年，蘇聯使用飛機七一二架，進犯五五五次；船艦一、九七七艘，進犯五五五次；車輛一四三部，進犯七六次；人員一、九一三人，進犯三六五次。

(3) 最近的主要事件，計有：(A) 一九七三年六月，將黑龍江中流中國船隻開砲擊沉，死一人，被擄一人；(B) 一九七五年八月，中國貨船在黑龍江黑河鎮作業中，有蘇聯警備艇二艘接近，投下起重機二台，意圖掀起大的波浪；(C) 一九七六年五月，蘇聯軍用機侵入中國領空九〇公里，東西二〇公里。

註① 參見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日本經濟新聞」第五面該報岡田特派員北平電訊。

丙、珍寶島事件

(1) 珍寶島位於距中國河岸六〇公尺、距蘇聯河岸三〇〇公尺處。迄至一九五一年止，尚接連中國岸邊陸地，現今枯水期仍然相連。從一九六七年起到第一次武裝衝突（一九六九年三月）止，蘇聯共侵入六次，中共警備兵三〇餘人因而受傷。

(2) 一九六九年第一次衝突時（三月二日），蘇聯死傷七〇餘人，中共死二〇人，負傷三四人，第二次衝突時（三月十五日），蘇聯死六〇餘人，傷八〇餘人；中共死十二人，傷二二人。

丁、河川航行問題

在三、七〇〇公里邊界河流中，船舶航行的可能距離為二、六〇〇公里。其中以黑瞎子島附近最易發生問題。一九五〇年的「中」蘇國境協定中，雖然規定對航行不加干涉，但蘇聯以實力佔據該島，以靠近中國的撫遠水邊為界，並要求中國船隻應用蘇聯領航。一九六七年五月，蘇聯曾拘捕中共的航路標識船。一九六八年曾發生對中國貨船乘員施加暴行以及拘留事件。又一九六七年以降，蘇聯對中國船隻發砲、暴行、掠奪、干涉事件，多達六〇〇次以上。迄今在上述水路航行仍有極大危險。

戊、邊界談判

一九七六年共舉行四次，蘇聯除勸誘中共方面代表逃亡蘇聯外，并常以黃金、手錶等實行收買^②。

這自然是中共的一面之詞，蘇聯也許還有它的說法。不過，蘇聯也慣用兩手政策，對中共表面和解，實際威脅利誘，當係實情。這也正是雙方談判沒有進展的另一原因。

二 第三者可以插手中蘇共糾紛嗎？

中共和蘇聯的關係能否改善呢？這在毛澤東死後，就更受到人們的注意。

就蘇聯言，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向蘇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會提出「總結報告」，當他提到與中共的關係時，有下述的一段話。他說：「和中共的關係是一個特殊的問題。他們的政策公然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甚而與全世界最反動派的立場吻合。這種政策不僅異於社會主義的原則與思想，而且實際上已成爲帝國主義反社會主義鬥爭的重要後備力量」。「在對中國的關係方面，我們黨恪守二十四大所決定的方針。我們將與毛澤東主義繼續進行鬥爭，一種基本性的、絕不妥協的鬥爭」。「在對中國的態度上，我們也像對其他國家一樣，將恪守平等、尊重主權領土完整、不干涉彼此內政、不使用武力等原則。並準備在和平共處的原則上，與中國關係正常化。如果北京恢復了真正以馬列主義爲基礎的政策，不再有仇視社會主義國家的方針，並且走上與社會主義陣營合作、團結的途徑，那麼這就可以爲蘇、中良好關係的發展帶來一個機會。這種良好關係是符合社會主義國際主

註② 同年十二月廿一日日本「每日新聞」第四面載十八日「共同社」北平電訊。

義的原則的。事情在乎中國方面了。」

這是在毛澤東死亡以前的蘇共對中共政策，語氣十分強硬。它要堅持粉碎毛澤東思想，那是理論與策略之爭，是意識形態之爭，也就是所謂原則性鬥爭。但是，蘇聯並不反對在和平共處原則基礎上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並且希望有一天，雙方會恢復所謂符合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原則的關係。

蘇聯現今所改變的也只是態度而非立場。如所週知，在毛澤東死後，蘇聯曾經停止對中共的抨擊，對於大陸的派系鬥爭與「四人幫」問題，只作報導，不加評論。直到一九七七年二月以降，才有指名責難中共的事實。儘管中共一如過去斥責蘇聯為新沙皇，蘇聯却表現了高度的忍耐力，且有一些向中共示好的舉措。

舉例來說，第一、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在三十一屆聯大演說中稱，蘇聯同中國關係正常化，不僅對於亞洲，就是對廣泛的國際局勢而言，無疑都將具有積極的效果。十一月十一日「真理報」總編輯阿芳納歇夫在紐約談稱：「『中』蘇之間包括邊境軍隊問題在內，沒有什麼是不可以友好地解決的。」同月二十三日，蘇聯國防部機關報「紅星報」在「亞洲的安全保障」一文中，強調要維持亞洲和平，就得重視蘇聯和中共的關係正常化。這些都可看作是故示「和平」意願，以間接反駁「北方威脅」之說，阻撓美、日、中共組成新三角。第二、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真理報」為中共政權成立發表專文致慶，於呼籲同中共關係正常化之同時，特別稱頌中共的「八大」路線，并建議在沒有前提條件的情況下與中共恢復邊界談判。過去，蘇聯一直斥責毛澤東背叛了「八大」路線，因此稱頌「八大」路線，即等於變相批判毛澤東思想。至於恢復談判而不要前提條件，即不同意中共所提先撤軍再談判解決全部邊界問題的主張。如此看來，蘇聯是表面「緩和」而立場堅定，並未作實質讓步。第三、同年十月二十五日，布里茲涅夫在蘇共中央全會報告時指出：（A）中共目前正經歷着複雜的內部政治過程，結局如何，今後將執行什麼政治方針，現今還很難說。但現在已經清楚的是，近十五年來，北平推行的對外政策路線，在全世界已經聲名狼藉；（B）同「中國」改善關係是蘇聯的一貫方針，蘇聯願在「和平共處」原則基礎上使關係正常化；（C）正如同蘇共二十五次大會上所指出的，蘇聯是恢復蘇「中」兩國符合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原則的睦鄰關係的擁護者，我們認為在蘇「中」關係中，沒有不能在睦鄰精神下解決的問題，蘇聯準備在這方面努力，問題在另一方將採取什麼立場。布里茲涅夫所謂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即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蘇聯近來常作此改稱，那是社會主義國家間的相互關係準則，而「和平共處」原則只適用於社會制度不同國家即共產國家與非共產國家之間。布里茲涅夫首先否定了中共現行的對外政策路線，然後第一步希望與中共先在「和平共處」原則下關係正常化；第二步再在「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原則下恢復兄弟國家的關係。

就中共言，它曾以沒有黨的關係為由，拒收蘇共及若干東歐共黨為毛澤東死亡所發的唁電，事後，中共「外交部」副部長余湛說：蘇聯明知在沒有黨與黨的關係的情況下，用黨的名義拍發唁電，中共是不會接受的，但它仍然這樣做，那是一種蓄意迷惑世界

的騙術。它若以政府名義拍發，我們是會接受的，蘇聯本來就沒有弔唁的意思^③。

此後，中共收下了蘇聯政府為中共政權成立紀念所發給中共「政府」的賀電，中共也以「政府」名義為蘇聯十月革命紀念向蘇聯政府拍發了賀電。這一切都表示中共仍然嚴格劃分黨與黨及國與國的關係，但并不顯示雙方關係的好轉或惡化。

中共這樣劃分黨與國的關係，由來已久，而且迄今并無改變。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日，李先念曾告法國記者代表團說：「中」蘇關係的改善，只有蘇聯重建史達林主義，並在全世界之前，明白宣布放棄黑魯曉夫以來的全部政策，方有可能。同月六日，譚震林對菲律賓記者代表團談稱，除非蘇聯首先認錯，並大量減少部署在中蘇邊界的軍隊，否則「中」蘇關係就不可能正常化。又說，要消除雙方意識形態的鬥爭，至少需要一千年，甚至可能要一萬年。李、譚二人所言，仍然是原則性亦即意識形態之爭，屬於黨與黨的關係。所謂千年、萬年，也是仿效毛澤東對史諾談話時的口吻^④。這并不表示中共不願在適當條件下，使雙方國家關係正常化。余湛也說過：「中」蘇邊界談判還在進行中，由於雙方協議，內容不便公開，但如明瞭「中」蘇關係的全部背景，這項談判究竟如何，也就不難理解。中共希望「中」蘇關係向好的方向發展，不願見其惡化，但蘇聯只是說些無聊的空話，不曾採取任何實際措施^⑤。中共不願關係再行惡化，應該是可信的。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死亡，當天下午中共發表「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聲言要繼承毛的「遺志」，「繼續堅決貫徹執行」毛的「革命外交路線和政策」。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人民日報」第一版刊載中共「外交部」理論學習組所寫的「學習周總理的光輝榜樣，為貫徹執行毛××的革命外交路線而奮鬥」一文，文中談及一九六九年九月周恩來和柯錫金的北平機場會談時稱：「在會談中，周總理重申了毛××的方針，中蘇之間的原則爭論要長期進行下去，但這種爭論不應妨礙中蘇兩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正常的國家關係。周總理建議，雙方首先簽訂維持邊界現狀、防止武裝衝突、雙方武裝力量在邊界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的臨時協議，並進而談判解決全部邊界問題。周總理提出的這一主張是十分合情合理的，雙方就此達成了諒解。」文章接着說：「幾年來，中國方面始終按照兩國總理達成的諒解進行談判，而蘇聯方面却不肯履行諾言，堅持社會帝國主義的立場」。中共是藉此表示它的對外政策路線及其與蘇聯談判的立場，均未有改變。

中共要持續與蘇聯的原則性鬥爭，一則是因為它們對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與策略本有分歧，再則中共尚有與蘇共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之意。自史達林死後，中共即不甘願久居「兒子黨」與附庸地位，因而拒絕與蘇聯恢復「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關

註③ 一九七七年二月六日日本「每日新聞」第四面，刊余湛對該報編輯局長平野勇夫的談話。

註④ 史諾「同毛澤東的一次交談」中記載，談到意識形態問題時，毛稱，「後來他們（蘇聯）派了一些古巴人，隨後又派了羅馬尼亞人去要求停止公開論戰。毛說，那不行。如果必要的話，要爭論一萬年。後來柯錫金本人來了。他們會談後，毛對他說，他將減少一千年，但是不能再減了」。史諾著陳雲翻譯「漫長的革命」，一八七頁。

註⑤ 余湛對平野勇夫談話。

係。但如能有較為平等的地位，中共并不拒絕與蘇聯在「和平共處」原則下使關係正常化。蘇聯要否定毛澤東思想與其對外政策路線，也不願在原則性問題上妥協。它希望將來能在「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原則下，將中共政權重新拉回自己的懷抱。在此希望未能實現前，也不拒絕在「和平共處」原則下使雙方關係正常化。那麼，就在「和平共處」原則下關係正常化一點而言，二者似乎彼此一致，但又爲什麼不容易實現呢？

蘇聯的企圖，是藉軍事壓力（包括顛覆活動）迫中共「正常化」，進而使後者放棄其分歧的意識形態，重返「社會主義友好大家庭」，接受蘇聯的領導。中共的企圖，是藉意識形態的分歧，削弱蘇共在國際共黨中的領導地位；藉邊界糾紛揭露蘇聯的社會帝國主義面貌；借助美國、拉攏日本與西歐，迫使蘇聯減輕邊境壓力，而後在比較平等的地位上與蘇聯「正常化」，但不願輕易重返「社會主義大家庭」。然則，在北平與莫斯科的爭執中，第三者能够插手嗎？

尼克森曾經說過：「我們沒有製造中共與蘇聯之間的糾紛」。他認爲中共和蘇聯之間的思想理論爭執以及邊界問題等等，「這些都是很難由我們加以處理的」^⑥。的確，中共和蘇聯的思想分歧，是有關如何對內建設社會主義對外埋葬資產主義的理論與方式之爭，即使鬥爭一萬年，自由世界又如何能插手？至於邊界爭端，是一個歷史問題，美國自然也無能爲力。更何況它們之間的糾紛，根本不是由邊界問題引起的。

中共并不急於完全解決邊界問題，使它懸而不決，對中共的鬥爭策略反而有利。它所急於解決的是如何使蘇聯減輕在邊境上的軍事壓力，它不願意在這種壓力下從事不利的談判。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日，周恩來對北歐記者們談話時說：「蘇聯有一百萬軍隊集結在這（中蘇）邊境，而他們聲稱這些軍隊的宗旨不是作戰的。那麼，他們必定是爲談判目的而集結的。他們想使我們在壓力之下進行談判……」^⑦。直到最近，中共還曾公開聲言：「中國怎能在大軍壓境情況下去尋求友誼」^⑧？在大軍壓境情況下尋求到的將不是友誼，而是在苛刻條件下屈服。那是中共不肯幹的，但這并不表示中共不願緩和它和蘇聯的緊張情勢。

記得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周恩來在北平「人民大會堂」接待六十多名美國訪客，當時他曾聲言：「只有能戰者，方能談和，若欲從事和平談判，必須先對作戰有所準備」^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日，喬冠華在聯大發言談到非洲問題時，曾經說：「談一定要立足於打」。一九七六年的第三十一屆聯合國大會中，喬冠華講話時，仍然在鼓動第三世界先有「力量」，再從事「對話」。這些都并非完全針對蘇聯而發，但在對蘇聯的關係上，同樣可適用此一和戰哲學。換言之，備戰與求和是并不衝突的，或許備戰正所以求和。了解到這一點，我們再回頭來看看美國的「插手」政策，是否允當而有效。

註⑥ 一九七二年二月九日尼克森外交咨文。

註⑦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路透社」北平電。

註⑧ 見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香港「文匯報」第三版「時事述評」。

註⑨ 見袁文瀾著「世界和平幻想旅行——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大陸」，一九七二年四月版，六五頁。

尼克森雖曾說明美國沒有製造也不能處理中共和蘇聯的爭執，但就從他開始，美國一直在想利用此二者之間的矛盾而實際插手其間。由於美國希望在均勢下維持和平，於是，它要阻止蘇聯突襲中共，因為那會破壞均勢，不合乎美國的利益；同時，它又不願見那兩個共產政權言歸於好，因而又想到扶持中共來制衡蘇聯，且可藉此減輕蘇聯對美國及其盟邦的威脅。問題所在，是連美國人也不相信現今中共真有這份力量。

一九七五年秋季的美國「外交政策」季刊上，曾刊有藍德公司研究員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所發表的一篇文章，標題為「美國與中共的軍事聯合」？他對美國可否軍援中共的問題，放出一隻試探汽球。依他看來，美國的武器和軍事技術，可抑制蘇聯對中共的奇襲與軍事壓力，如果美國加強中共的軍事力量，蘇聯就不得不削滅它對付美國盟邦的兵力。他還為這項「軍援」提出幾點初步建議。我們不能不指出，白邦瑞希望蘇聯軍事力量擺在「東」方，周恩來却曾指出蘇聯是「聲東擊西」。看來，中共不想替西方做「調虎離山」的誘餌！

一九七六年十月出版的「外交季刊」，刊有哈佛大學教授柯恩（Jerome A. Cohen）所撰「下任政府的中國政策」一文，也主張軍援中共以抗衡蘇聯。又美國前國防部長斯勒辛格（James R. Schlesinger）則於一九七六年九月六日赴中國大陸訪問，他曾前往內蒙、新疆維吾爾及西藏等自治區，參觀了中共和蘇聯緊張的前線地帶及部分核子設施。他透露他和華國鋒長達三小時的會談中，大部時間是談論「中共防止蘇聯武力日增的意願」。他認為中共已有相當強大的抗蘇力量，但仍有待加強，因此美國不應該排除出售某些軍事裝備給中共的可能性。據「紐約時報」軍事編輯米度頓（Drew Middleton）透露，當他在大陸和伍修權談話時，後者也並不排除自「其他國家引進裝備」的可能性，只是他表示，這類國家「或許不會慷慨地把裝備給我們」，最後他的結論是「我們最好還是靠自己的力量」。但福特總統已批准出售美國康屈羅資料公司的「CYBER」171型電腦系統及相關設備給中共。日本日立製造所的大型電子計算機，也將申請賣給中共。這些許東西，當然還不够「加強」中共的軍事力量。不過！應該注意的是，中共和戰哲學與美日不同，它的政策也不是在華盛頓或東京制定，假若他一旦接受援助，稍稍得與蘇聯抗衡，它就可戰可和（那均非美國所願），它將如何選擇呢？依共產本性判斷，它將利用此種條件作為向蘇聯討價還價的資本，以對抗的姿態，博取對自己較為有利的「和解」。

要知道，北平「邊界談判」開始之前，中共政權於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的「聲明」中稱，它在同年九月十八日就有一項正式信件給蘇聯政府，信中說：「為了使兩國邊境局勢得以緩和下來，使中蘇邊界談判能不受任何威脅的情況下舉行，中國方面建議，中蘇雙方首先就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脫離接觸的臨時措施達成協議」。前引中共「外交部」文章中，也提到這項建議。中共此一態度迄未變更，而蘇聯堅不應允，就成為問題的癥結。倘使美國加強了中共的軍事力量，也就提高了它的發言權，蘇聯再稍作讓步，和中共達成維持現狀、避免武裝衝突的臨時協議，那麼雙方的關係就會在「和平共處」的原則下「正常化」起來。到那

時候，中共會把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問題連同美國利益，一起都暫且擺在腦後。

從去年十一月伊里切夫返平後，北平「邊界談判」以每週兩次會談的速度進行，但實際却毫無進展。二月十日，蘇聯的「真理報」又開始對中共指名攻擊。二十八日，伊里切夫向記者扮一個鬼臉就搭機返俄了。中共和蘇聯的關係，仍然在冰凍中。過去，若干美國人士主張趁毛澤東未死前，搶先和中共「關係正常化」，以防兩個共產政權再度攜手，及今看來，真是完全沒有必要。至於軍援中共的設想，那就不僅沒有必要，或許會反而加速北平和莫斯科的「和解」，甚且會發生若干不良後果。

三 一些展望

中共與蘇聯是不容易重修舊好的，邊界談判更不容易有結果。因為：(一)中共目前依然在執行毛澤東的革命外交路線，以反蘇為突出特徵的所謂「三分天下」，關係着中共整個對外活動的戰略部署，不容易也不會輕易改絃易轍；(二)目前中共內部沒有人有足够的權威，可以驟然擅改毛制定、周執行的對外政策路線；(三)幾年的反蘇教育結果，使共幹們會慎重避免親蘇色彩，以免在永無休止的鬥爭中，被人給戴上「投降派」、「裏通外國」的帽子；(四)中共不願重回到「一邊倒」的附庸地位，蘇聯則不願中共向它的權威挑戰，致使其他附庸羣起效尤；(五)雙方都把邊界談判當作鬥爭工具，其他問題不解決，邊界談判就不會有結果。

另一方面，假定現實情況沒有急劇的變化，我們也找不到莫斯科和北平的緊張會增長增高的理由。原則性鬥爭固然不易解決，但如果蘇聯被迫或自願減輕它對中共的壓力，則中共和蘇聯就已經「正常化」，那也并不違反毛周以來的立場。

在當前的情況下，較有可能性的發展是：(1)繼續進行原則性鬥爭；(2)在「和平共處」原則下緩和緊張情勢；(3)暫難恢復「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關係。

不過，任何一種國際關係，不會是永遠靜止不動的，中共和蘇聯的關係，自不例外。就是極難解決的所謂意識形態之爭，那也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一九五五年「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一九五四年俄文第四版譯出的「簡明哲學辭典」上，「毛澤東」佔了很大篇幅，且稱之為「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領袖，馬克思主義的大理論家，中國人民勝利的組織者」^⑩。又一九五四年版蘇聯「大蘇維埃百科全書」上，毛澤東還被稱為「傑出的中國政治及政府活動家、卓越的理論家、馬克思主義者，富有經驗的中國共產黨領袖……」。但一九七四年版蘇聯「大蘇維埃百科全書」上，毛澤東僅被稱為「中國的政治與政府活動家」，却以很長的文字去批判一九五八年以後的毛澤東政策。另一方面，中共對蘇聯先恭後倨、先友後敵的變化，更是非常迅速的。依我們想，另一次的變化，即使來得比較緩慢，但也決不需要一萬年。至於自由和共產兩個集團乃是兩個世界，永遠不會成為真正朋友，那是可以肯定的。共產集團的矛盾，當然可以利用。問題是如何作法，自由世界才不致由利用者變成被利用者。

註⑩ 該辭典為羅森培爾(M. Rozenal)、尤金(P. Yudin)合編，所引見原譯本六四頁。